

第一章

数字经济概述

本章学习目标

1. 了解数字经济的产生与历史演进；
2. 了解我国互联网经济的发展历程；
3. 掌握数字经济的定义与特征；
4. 掌握数字经济“四化”框架及内涵；
5. 深刻理解数字经济对新质生产力的支撑作用；
6. 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内涵；
7. 掌握数字经济下生产力的新构成，以及数字经济中生产关系的变化动因。



2022年，国务院发布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大势所趋。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推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深刻变革，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数字经济是数字时代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也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因此，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

第一节 数字经济的产生与历史演进

一、数字经济的产生

1996年，唐·塔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发表著作《数字经济：网络智能时代的前景与风险》，首次明确提出“数字经济”这一概念。在这本书中，作者详细论述了互联网对数字经济的影响，深入探讨了互联网如何改变商业、政府和社会的运作方式。

1998年，美国商务部发布《新兴的数字经济》报告，详细分析了数字技术对经济的影响，尤其关注如何在新经济形态中促进增长和提升竞争力。报告指出，数字经济正在变革传统产业，推动经济全球化，同时也带来了诸如就业结构变化等社会挑战。由此，“数字经济”成为正式的经济学概念。

2002年,美国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数字经济,强调了数据和信息技术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这些研究不仅加深了对数字经济的理解,也为政策制定和企业战略提供了重要参考。从此,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研究的热点。

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G20(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上首次对“数字经济”进行了强调,之后我国开始在官方文件和重大场合采用“数字经济”的提法。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促进数字经济加快成长”的正式表述,标志着“数字经济”成为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大发展战略。

二、数字经济的历史演进

数字经济的起源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这个时期,计算机发展到集成电路时代,计算机组成系统都是采用二进制数字表示,由此数字数据随着计算机的普及应用逐渐进入人类的社会生活之中。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创新消费方式在全球范围迅速发展,开启了消费驱动的互联网经济时代。互联网经济的强大活力,带动了全球数字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快速增长,为数字经济奠定了发展基础。

进入21世纪,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逐渐普及,人们可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访问互联网,社交网络、移动支付、短视频等各种创新应用不断涌现,共享经济、平台经济(platform economy)模式相继登场,实现了高效率的资源共享和经济增长,推动着数字经济进一步快速发展。

在日益增长的互联网经济活动中,产生了海量的用户数据。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的过滤、筛选,进行专业化数据加工与分析处理,提升了网络数据价值,数据升华为信息、知识和智慧。以大数据分析为特征的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为数字经济提供了新的内容和动力。

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在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运营管理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为数字经济向智能化方向发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新质生产力要素。

综上所述,从计算机到互联网,再到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关键技术创新对宏观经济结构与运行模式、微观企业组织形态与治理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数字经济成为一种由技术创新驱动的新型经济形态。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数字经济将为世界各国经济注入新的活力,成为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

第二节 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历程

1998—2018年是我国互联网经济蓬勃发展的黄金20年。这个时期,我国互联网行业从初生期、成长期到成熟期,各种技术和应用创新层出不穷,渗透到我们的经济社会生活中,涉及衣食住行、社交娱乐等众多领域的每一个细节,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与工作方式。

一、中国互联网元年

1995年,北京中关村出现了一块巨幅广告牌:“中国人离信息高速公路还有多远——向北一千五百米。”从这块广告牌向北走1500米,就是中国第一家互联网企业——北京瀛海威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瀛海威公司”)。瀛海威公司是一家主要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的ISP(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公司,其商业模式是从原邮电部(中国电信)批发网络带宽资源,然后加价零售给网络用户,经营模式是通过“瀛海威时空”网络客户端为公共用户提供电子邮件、论坛、聊天室、游戏等收费网络服务。

瀛海威公司的创办者张树新,毕业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应用化学系,被誉为“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启蒙者和开拓者”。可以说,张树新是第一个提出“百姓网”概念的理想主义者,但是在当时处于萌芽状态的新兴市场中,我国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互联网生态,瀛海威公司不得不承担起为中国互联网“培育市场”的公益使命,做了很多非商业范畴的努力和付出。在经历了无数次失败的调整之后,瀛海威公司除了收取用户的接入网费用以外,始终没有找到增值服务新的盈利模式,最终于2004年正式注销。

关于瀛海威公司的成败教训,我们可以从张树新的自述中来体会其创业的艰辛。在创办瀛海威公司初期,张树新勾勒出一个宏伟的蓝图:“在世界之初,我想象过所有事情,哪里种树,哪里栽花,潮怎么涨,土在哪里,这些我都在脑子里想好了。”在瀛海威公司遭遇事业窘境时,张树新又用一个比喻来形容其失败的教训:“我们本来是要卖面包的,后来我们要从种麦子做起。而卖面包的利润却无法负担种麦子的成本。”

二、初生期：互联网创业时代

1995年,杨致远在美国硅谷创建的Yahoo网站享誉全球,免费开放的门户网站显示出其所蕴含的巨大价值和发展潜力,开启了我国轰轰烈烈的互联网创业时代。

1997年,丁磊在广州创办广州网易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先后开通BBS(网络论坛)服务和163免费电子邮箱,获得了注册用户的快速增长。到1998年9月,网易顺势转型成为类似于Yahoo的分类搜索网站,提供网易社区和免费的网络门户服务。

1998年2月,张朝阳在北京的搜狐网上线,先后推出搜狐门户、搜索引擎等系列网络服务,获得了众多美国投资机构的青睐。同时,张朝阳获得美国《时代》周刊“全球50位数字英雄”提名,并被誉为“中国互联网教父”。

1998年12月,新浪网成立,王志东凭借其曾为中国内地成功引入第一笔美国高科技风险投资及出色才能,出任新浪网掌门人。新浪网是一家服务于中国及全球华人社群的网络资讯公司,实现了海峡两岸暨香港、澳门新闻资讯的全面整合,成为服务于全球华人的中文网络门户,被称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第一新闻门户网站。

网易、搜狐和新浪网成为当时中国的三大门户网站,被称为“互联网三剑客”。它们带来的门户网站、搜索引擎以及风险投资等全新的商业概念和服务,帮助中国企业置身于全球化大环境之中,开启了一个轰轰烈烈的中国互联网创业时代。

在这场互联网创业浪潮中,1998年还悄悄诞生了两家小公司,一家是刘强东在北京成

立的北京京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公司”),一家是马化腾在深圳创建的深圳市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讯公司”)。

1999 年是中国的电子商务元年。这一年,在国际化风险投资的热捧下,互联网经济在全球兴起,众多的中国电子商务平台成立或开始运营。

1999 年 3 月,马云在杭州创办阿里巴巴网站,开展 B2B(指电子商务中企业对企业的交易方式)模式的在线黄页业务,其商业目标为建立批发贸易的中国交易市场,帮助中国小商品制造出口走向国际。

1999 年 5 月,被称为“中国电子商务第一人”的王峻涛创办 8848 网站。2000 年 1 月,8848 网站被中国互联网大赛评为中国优秀网站“工业与商业类”第一名。2000 年 4 月,8848 网站正式开通中国第一套开放式网上商城系统并投入运营。

1999 年 8 月,邵亦波创办了国内首家 C2C(指电子商务中消费者对消费者的交易方式)电子商务平台易趣网。易趣网成为当时国内最大的个人在线交易社区。

1999 年 10 月,梁建章及合伙人共同创建了携程旅行网,从早期提供在线票务服务逐渐成长为旅行产品的网上一站式服务,业务范围逐渐涵盖酒店、机票、旅行线路预订及商旅实用信息的查询检索。

1999 年 11 月,李国庆复制 Amazon 商业模式成立当当网,建立了中国首家 B2C(指电子商务中企业对消费者的交易方式)模式的网上书店。当当网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图书资讯集成商和供应商。

1999 年,甄荣辉创建 51job 网(前程无忧)。该平台后来发展成为一家集多种媒介资源优势于一体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主要提供包括招聘猎头、培训测评和人事外包业务在内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

2000 年 1 月,李彦宏在北京中关村创立百度在线网络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度公司”)。依赖中国搜索引擎服务的市场潜力和优势,百度公司迅速发展成为中文搜索引擎第一、全球搜索引擎第二的巨头公司。

创业时代的中国互联网企业如同雨后春笋般与日俱增,境外的风险投资也疯狂涌入中国境内,尤其是三大门户网站先后在美国 NASDAQ(纳斯达克)上市,进一步催生了中国互联网行业的浮躁。2000 年,NASDAQ 指数达到巅峰的 5 132 点之后,开始了历时 3 年的持续调整。2002 年,NASDAQ 指数跌至 1 108 点,资本热钱捧起来的全球互联网大潮退去,以“烧钱”模式运营的中国互联网泡沫随之破灭。至 2001 年,国内 75% 以上的第一代电子商务企业退出市场或者转型发展,这一场热火朝天、激情四射的互联网创业时代由此落幕。

在 2000—2002 年互联网行业寒冬之中,中国互联网企业迫切需要找到持续可行的盈利模式。“应不应该收费”和“什么服务应该收费”成为当时互联网商业模式转型的核心问题。在这场收费模式的探索中,腾讯公司及网络游戏产业成了最大的赢家。2002 年,OICQ 改名为腾讯 QQ,通过持续创新满足用户潜在的社交和娱乐需求,先后发布 QQ 会员、QQ 群、QQ 秀、QQ 空间、QQ 游戏等全新的服务功能及营销模式,由此开启了腾讯的崛起之路。

三、成长期：互联网黄金时代

2003 年春天,SARS(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病毒的蔓延打乱了人们正常的生活和商业

活动,社交网络和电子商务乘势而起,互联网行业的黄金时代奇迹般到来,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三大互联网巨头先后崛起,电子商务、网络游戏、社交网络和内容服务网站成为新的互联网四大支柱产业。

(一) 电子商务

2003年,阿里巴巴抓住了历史机遇,先后推出B2C网上交易平台淘宝网和第三方电子支付平台支付宝,为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网络销售平台,同时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方便的网上购物体验。淘宝网的成功催生了中国电子商务行业的跳跃式发展,阿里巴巴成为我国电子商务行业发展壮大的先驱者。

2004年,刘强东的京东公司开始转型电子商务领域,开通京东多媒体网,后来更名为“京东商城”。京东公司以自营商业模式为主,致力于提供优质商品服务和提升用户购物体验,通过自建物流和仓储等方式深入供应链上下游,逐渐从单纯的电商平台打造成为一体化供应链服务型企业。

(二) 网络游戏

1998年3月,鲍岳桥与合伙人共同成立北京联众电脑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这是我国第一家提供在线棋牌游戏业务的公司。到2003年,联众游戏已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网络游戏娱乐网站。

2003年8月,腾讯QQ游戏发布,凭借QQ的社交网络流量与推广优势,仅在正式运营一年后不久,QQ棋牌游戏同时在线人数就迅速赶超联众游戏,奠定了腾讯公司在国内社交网络游戏的霸主地位。

同年,陈天桥创办的盛大网络发布第一款自主研发的网络游戏《传奇世界》,开创了“游戏免费、增值服务收费”的创新商业模式——CSP(come-stay-pay)。CSP模式摒弃了传统的会员收费和广告盈利模式,依靠销售虚拟道具和提供增值服务盈利。后来,史玉柱创立的巨人网络的《征途》采用了“游戏免费+道具商城”模式,韩国T3娱乐公司的《劲舞团》采用了“游戏免费、皮肤收费”模式,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2011年,巨人网络在《征途2》游戏中开创了第三代商业模式——公平游戏模式,这是在会员收费模式、道具收费模式之后,网络游戏商业模式的又一次革命性创新。在第三代商业模式下,玩家不需要直接向运营商购买游戏时间或游戏道具,全部游戏道具由打怪掉落,且可以通过官方交易平台在玩家之间进行自由交易和流通,游戏运营商通过收取交易手续费获得经营收入。

(三) 社交网络和内容服务网站

Facebook和Twitter的成功,推动了我国互联网行业的第二次创业浪潮。

2005年,王兴等几名大学生创办面向大学生的实名制社交平台——校内网,通过发布日志、保存相册、音乐视频等资源分享功能,为大学生提供一个功能丰富的互动交流平台,承载了一代大学生的校园青春。2009年7月,校内网更名为人人网。

2008年,程炳皓等创立国内第一家以办公室白领用户群体为主的社交网站——开心网,为用户提供包括日记、相册、动态记录、转帖、社交游戏在内的丰富易用的社交工具,“好

友买卖”“抢车位”“偷菜”等休闲游戏风靡一时。

在这次创业浪潮中,杨浩涌和姚劲波分别创建了分类内容服务网站赶集网与 58 同城,迅雷影音、土豆网、优酷网等视频内容网站也在这一阶段纷纷崛起。

四、博弈期：行业竞争时代

随着行业规模的迅速增长,不断涌现的互联网企业使供需格局向供大于求转变,2009 年开始,我国互联网行业进入持久而激烈的竞争时期。

2009 年 5 月,开心网运营商起诉人人网运营商(千橡开心网)不正当竞争,要求北京千橡互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停用 kaixin.com 域名,这一案件称为“真假开心网案”。

2009 年 9 月,搜狐主导成立“中国网络视频反盗版联盟”,对迅雷网站长期盗版权利人作品行为发起法律诉讼;次月,优酷、迅雷分别对搜狐发起版权侵权和名誉权侵犯诉讼,由此引发国内多家视频网站的诉讼混战局面持续至今,案由包括知识产权权属侵权纠纷、合同纠纷、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等。

2009 年 11 月,搜狐旗下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起诉腾讯 QQ 输入法不正当竞争,随之腾讯公司提起反制性诉讼。这起“输入法第一案”同样引发了搜狐、腾讯、百度等公司持续 10 多年的以输入法侵权为案由的法律纠纷。

2010 年 11 月 3 日,腾讯宣布在装有 360 软件的电脑上停止运行 QQ 软件,用户必须卸载 360 才可登录 QQ,强迫用户“二选一”,由此引起奇虎 360 和腾讯 QQ 之间持续 4 年之久的“3Q 大战”,被称为“互联网反不正当竞争第一案”。

在电子商务领域,行业竞争形势更是异常激烈。

2010 年,号称“中国亚马逊”的当当网与京东公司发生了激烈的商业战,持续 3 年的价格大战导致当当网毛利率持续拉低,最终,当当网因严重亏损在 2016 年选择从纽约交易所退市。

2010 年还是团购起步的一年。由于团购行业门槛较低和资本的疯狂涌进,2011 年国内涌现了上百家同质化严重且良莠不齐的团购网站,在“衣食住行”等细分领域纷纷采用不计成本的“烧钱”补贴推广方式抢占市场份额。这场号称“百团大战”的混战持续了 4 年,一直到 2014 年,团购市场的竞争格局才逐渐趋向稳定。

2015 年,北京搜狗信息服务有限公司、北京搜狗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百度公司立即停止制作侵害“搜狗输入法”专利权的百度输入法侵权行为。该案件历时 4 年,一直到 2020 年 3 月才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二审终结。

2017 年,京东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指控阿里巴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行为。该案件历时 6 年,至 2023 年 12 月 29 日,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对京东诉阿里巴巴“二选一”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阿里巴巴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二选一”的垄断行为成立,判决阿里巴巴向京东赔偿 10 亿元。

互联网行业的激烈竞争,本质上是为获取用户规模而对流量入口的争夺。无论是三大门户网站鼎立、百度搜索一枝独秀,还是输入法专利权之争,以及众多公司因反不正当竞争付诸法律,都是针对电脑端 Web 用户的流量入口。2011 年,智能手机和原生移动端 App 软件的先后出现,为互联网行业打开了一个全新的高盈利模式流量入口。

五、成熟期：移动互联网时代

2011年,腾讯公司张小龙团队研发的移动端即时通信软件“微信”正式发布,为移动用户提供了全新的互联网体验,移动互联网时代即将到来。

2012年末,滴滴打车上线运营。滴滴打车的核心运营模式是根据智能手机的地理位置信息,通过大数据技术智能匹配契合的用户和出租车,其盈利模式是在交易成功后由平台抽取车辆调度佣金。

2013年被称为中国的移动互联网元年。这一年,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移动网络正式投入运营,标志着中国移动互联网迈入4G高速时代。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Web时代进入App时代,移动应用程序App和大数据分析技术使数字化营销更加智能化、精准化及个性化,微商、微店、O2O(线上到线下)模式、共享经济、平台经济、互联网金融等创新商业模式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2013年,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米公司”)借智能手机东风横空出世。2013年9月26日,小米公司荣获《财富》杂志2013年“最受赞赏的中国公司”;2013年11月11日,小米首次参加“双11”活动获得单店销售额第一、手机类品牌关注度第一、手机类单店销售额第一等多项荣誉;2013年12月12日,雷军荣获2013 CCTV(中国中央电视台)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奖。

2013年5月,微信发布公众平台功能,为企业和个人提供高效、便捷的微商、微店服务,显现出移动互联网强大的推广价值和营销价值,推动传统广告营销向数字营销模式的转变。

2013年6月,阿里巴巴旗下“蚂蚁金服”推出余额宝产品,提供支付宝余额增值服务和活期资金管理服务,互联网金融的概念由此声名鹊起;7月,新浪发布“微银行”进入理财市场;8月,“微信支付”推出;10月,“百度金融中心——理财”平台上线;11月,互联网保险公司众安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业;12月,京东推出“京保贝”快速融资业务,网易上线了“网易理财”。2014年,京东推出了“白条”,蚂蚁金服推出了“花呗”。

P2P(peer-to-peer,点对点)是一种基于互联网的民间小额借贷平台及相关理财服务。2013年,P2P网贷业务迅速发展起来,业务量较前5年总和增长了394%,达到1100亿元。2014年,P2P业务规模突破2500亿元。

2014年,菜鸟网络推出“仓配一体化”数字供应链服务。这是一种既没有仓储库房也没有物流车辆和快递人员,只凭借线上菜鸟App和线下菜鸟驿站,为商家、物流和消费者提供数字化订单管理、售后等一系列增值服务,从中抽取调度佣金的创新商业模式。

2015年春节,腾讯为员工发红包的灵感触发了微信红包的火爆,助力微信支付在移动支付市场迅速攻城略地。2014年第三季度,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市场份额分别为83%与不到10%,到2016年第三季度,二者的市场占有比例改变为52%和38%。

纵观整个2015年,互联网金融行业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局面。上半年,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政策推动下,互联网金融进入狂热期;下半年,随着中国股市出现大幅度回调,互联网金融也由盛转衰。尤其是P2P业务由于长期野蛮生长、缺乏法律监管,平台“跑路”事件频发,“e租宝”崩盘事件引发了监管对P2P平台的持续打击。2016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互联网金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互联网金

融风险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重拳出击,至 2020 年 11 月中旬,全国实际运营的 P2P 网贷平台市场出清。

2016 年是充满变革和挑战的一年,人工智能、共享经济、内容直播开启了技术创新引领行业发展的新的里程碑。

(1) AlphaGo 获得围棋人机大战的胜利,标志着人工智能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主流,带动无人驾驶技术、人脸识别技术和 VR(虚拟现实)技术逐渐走进大众视野。

(2) 摩拜单车和 ofo 小黄车等共享单车业务在全国大中城市迅速铺开市场,开创了一种新型的绿色环保共享经济模式。

(3) 快手和抖音等直播电商 App 开始火爆,催生了网红经济这种新兴的互联网商业模式,重塑了我国电商行业全新的竞争格局。

自 2017 年开始,我国互联网经济发展态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随着网络社会空间、互联网金融和平台经济垄断等互联网行业规范化治理的需要,2018 年成为互联网经济 20 年黄金发展期的最后一年。

2017 年 10 月,我国制定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和发展蓝图,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这标志着以国家主导核心技术产业发展,构建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创新驱动的数字经济时代正式来临。

第三节 数字经济的定义与特征

一、数字经济的定义

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新兴的经济社会形态。这是一场由现代信息技术革新引发的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治理方式乃至思维方式的深刻变革,其定义和内涵随着技术的发展而不断演进与深化。

2016 年,G20 杭州峰会通过的《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以下简称《倡议》)中对数字经济的描述,为当前广泛认可的数字经济定义提供了基础。《倡议》中说,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数字经济代表了围绕数据这种关键的生产要素所进行的一系列生产、流通和消费的经济活动的总和。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 年)》认为:数字经济是以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数字技术为核心驱动力,以现代信息网络为重要载体,通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不断提高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重构经济发展与治理模式的新型经济形态。

从技术的角度看,数字经济是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新兴数字技术为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和生产效率提升的目标。例如,大数据技术可以帮助企业更好地了解市场需求、优化产品设计,云计算技术可以实现计

算资源的共享和灵活调配、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物联网技术可以将各种设备和传感器连接起来,实现物理世界和数字空间的互联互通,区块链技术可以保证数据的安全性和可信度,人工智能技术可以模拟人类的思维和行为,实现自动化和智能化决策。

从经济的角度看,数字经济打破了传统产业的边界,促进了产业融合和创新,推动企业业务流程实现全链条数字化转型。例如,在生产环节,数字技术可以帮助企业实现生产过程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提高生产效率和质量;在供应环节,数字技术可以优化供应链管理,降低物流成本;在销售环节,数字技术则可以改变传统的销售模式为线上、线下混合销售模式,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和个性化的购物体验。

从社会的角度看,数字经济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以及社会治理方式。例如,信息通信网络推动了线上工作方式和灵活就业的兴起,使人们可以更加自由地选择工作和生活的方式;数据资源的开放和共享,促进了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的普惠化、均等化和优质化;数字政府建设改变了政府治理方式和政策制定方式,助力实现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型社会形态。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是一个复杂且多元的概念,它涉及技术、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创新,数字经济的相关概念也将持续演进,推动整个社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跃升发展。

二、数字经济的特征

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以数据为关键因素,继承和融合了信息网络、数字技术以及经济学等相关理论和实践应用,显现出其独特而鲜明的多元特征。

(1) 数字化和网络化。在数字经济中,信息以数字形式存在,并通过互联网进行快速而广泛的传播,企业可以通过信息网络触及全球客户,消费者也可以随时随地访问所需商户的信息和服务。这种无时无刻、无处不在的连接性,打破了传统的地理和时间限制,让经济活动更加灵活和高效。

(2) 数据驱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源成为关键生产要素,企业组织通过收集和分析大量数据来优化决策、提高效率并创造新的价值。数据驱动的辅助决策模式,能够帮助企业更加高效、精确地把握市场需求和消费者行为,大幅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

(3) 创新性和颠覆性。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推动了创新产品和服务的涌现,这些创新不仅满足了现有需求,还创造了新的市场和消费模式。例如,近年来不断突破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但在智能制造上颠覆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制造方式,而且在智慧医疗、智慧交通、智慧教育等新场景、新业态上展现出巨大的创新潜力。

(4) 高附加性。数字经济的价值包含数字劳动创造的价值以及数字技术应用于传统产业形成的产品和服务价值两个层面,技术和知识(信息)的高附加性不仅推动了传统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也给数字化企业带来了更大的附加利润空间。

(5) 高渗透性。数字经济中,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高度渗透到各个行业领域,数字化加速了产业的互相渗透和协同发展,有效推动了产业链重构和优化。这种高渗透性不仅提高了传统产业的效率和竞争力,也催生了大量新兴业态和商业模式。

(6) 开放性和平台化。平台经济通过构建一个开放的平台,为社会公众提供数字基础

设施和技术服务,使中小企业乃至个人都能加入数字经济活动中,实现企业价值、个人价值和服务价值的最大化。这种开放的平台化经营模式促进了多元化商业生态的形成,不仅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选择,同时也激发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创业活力。

(7) 虚拟性。其具体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一是数字经济中的产品和服务很多以数字化形式存在;二是数字经济通过互联网等信息通信技术实现了交易过程和支付的数字化;三是数字经济中的虚拟办公室和在线工作方式,使工作活动不再局限于物理空间;四是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AR)技术推动了社交网络与虚拟社区的兴起,创造了一种虚拟的互动方式和交流环境。

(8) 智能化。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觉等人工智能技术在数字经济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不但体现在通过智能化分析技术辅助决策、通过智能算法优化资源动态配置,以及促进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慧教育等新兴产业融合发展,还体现在通过数据训练和深度学习,实现未来智能化系统自我优化和不断进化的能力。

第四节 数字经济的体系框架

数字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态,人们对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和实践认知都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中对数字经济体系的描述先后经历了“两化”“三化”和“四化”框架的演变。

一、数字经济“四化”框架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17年)》中认为:结合数字经济发展特点,我们从生产力角度提出了数字经济“两化”框架,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数字经济已经超越了信息通信产业部门范畴,应充分认识到数字技术作为一种通用目的技术,广泛应用到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促进经济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提升,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与就业白皮书(2019年)》中认为:注意到组织和社会形态的显著变迁,我们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提出了数字经济“三化”框架,即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和数字化治理,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仅仅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更带来政府、组织、企业等治理模式的深刻变化,体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在《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中,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再次给出了数字经济进入“四化”协同发展新阶段的总结性描述:当前,以数据驱动为特征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深入推进,数据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经济社会实现从生产要素到生产力,再到生产关系的全面系统变革,为此,我们进一步将数字经济修正为“四化”框架。^①

数字经济“四化”框架主要包括下列内容。

^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0年)[EB/OL]. (2020-07-03).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202007/P020200703318256637020.pdf>.

（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重塑生产力,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

生产力是人类创造财富的能力,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基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蓬勃发展,加速重塑人类经济生产和生活形态。数字产业化代表了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方向 and 最新成果,伴随着技术的创新突破,新理论、新硬件、新软件、新算法层出不穷,软件定义、数据驱动的新型数字产业体系正在加速形成。产业数字化推动实体经济发生深刻变革,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广泛深度融合,开放式创新体系不断普及,智能化新生产方式加快到来,平台化产业新生态迅速崛起,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方兴未艾,产业转型、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迎来增长全新动能。

（二）数字化治理引领生产关系深刻变革,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保障

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数字经济推动数据、智能化设备、数字化劳动者等创新发展,加速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推动治理体系向着更高级迈进,加速支撑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提升。在治理主体上,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协同治理体系加速构建,数字化治理正在不断提升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在治理方式上,数字经济推动治理由“个人判断”“经验主义”的模糊治理转变为“细致精准”“数据驱动”的数字化治理;在治理手段上,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在治理中的应用,增强态势感知、科学决策、风险防范能力;在服务内容上,数字技术与传统公共服务多领域、多行业、多区域融合发展,加速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

（三）数据价值化重构生产要素体系,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础

生产要素是经济社会生产经营所需的各种资源。农业经济下,技术(以农业技术为主)、劳动力、土地构成生产要素组合;工业经济下,技术(以工业技术为引领)、资本、劳动力、土地构成生产要素组合;数字经济下,技术(以数字技术为引领)、数据、资本、劳动力、土地构成生产要素组合。数据不是唯一生产要素,但作为数字经济全新的、关键的生产要素,贯穿数字经济发展的全部流程,与其他生产要素不断组合迭代,加速交叉融合,引发生产要素多领域、多维度、系统性、革命性群体突破。一方面,价值化的数据要素将推动技术、资本、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发生深刻变革与优化重组,赋予数字经济强大发展动力。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相结合,催生出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金融科技等“新资本”、智能机器人等“新劳动力”、数字孪生等“新土地”、区块链等“新思想”,生产要素的新组合、新形态将为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释放放大、叠加、倍增效应。另一方面,数据价值化直接驱动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转型升级。数据要素与传统产业广泛深度融合,乘数倍增效应凸显,对经济发展展现出巨大价值和潜能。数据推动服务业利用数据要素探索客户细分、风险防控、信用评价,推动工业加速实现智能感知、精准控制的智能化生产,推动农业向数据驱动的智慧生产方式转型。

（四）数字经济发展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

发展数字经济,构建以数据价值化为基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为核心、数字化治

理为保障的“四化”协同发展生态,既是重大的理论命题,又是重大的实践课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辩证统一的内在逻辑。四者紧密联系、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处理好四者间的关系,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当前,数字技术红利大规模释放的运行特征与新时代经济发展理念的重大战略转变形成历史交汇,发展数字经济,构筑数字经济发展新优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正当其时,意义重大。

二、数字经济的内涵

数字产业化即信息通信产业,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导产业,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技术、产品、服务和解决方案等。其主要涉及电子信息制造业、电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领域。数字产业化包括但不限于5G、集成电路、软件、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技术、产品及服务。

产业数字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主阵地,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产业数字化是指传统产业应用数字技术所带来的生产数量和效率提升,其新增产出构成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不是数字的经济,是融合的经济,实体经济是落脚点,高质量发展是总要求。产业数字化包括但不限于工业互联网、“两化”融合、智能制造、车联网、平台经济等融合型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数字化治理是数字经济创新、快速、健康发展的保障。数字化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是运用数字技术,建立健全行政管理的制度体系,创新服务监管方式,实现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组织、行政监督等体制更加优化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数字化治理包括治理模式创新、利用数字技术完善治理体系、提升综合治理能力等。数字化治理包括但不限于以多主体参与为典型特征的多元治理、以“数字技术+治理”为典型特征的“技管结合”,以及数字化公共服务等。

数据成为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加快推进数据价值化进程是发展数字经济的本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数据可作为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202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数据可存储、可重用,具有爆发增长、海量集聚的特点,将成为实体经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的基础性战略资源。数据价值化包括但不限于数据采集、数据标准、数据确权、数据标注、数据定价、数据交易、数据流转、数据保护等。

第五节 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共同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质生产力依托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通过优化生产要素配置、提升生产效率,为数字经济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而数字经济则以其数据驱动、数字化运营等特性,为新质生产力的应用提供了丰富的场景和高效的手段。两者相辅相成,共同塑造着我国未来的经济格局和发展模式,并推动着全球经济向更加智能化、高效化的方向发展。

一、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①

2024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这一重要论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深化了对生产力发展规律性认识,进一步丰富了习近平经济思想的内涵,为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提供了科学指引。

(一) 新质生产力的基本内涵

新质生产力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演进方向,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新质生产力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具有强大的发展动能,能够引领创造新的社会生产时代。

(1) 更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的第一要素。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提出更高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引领世界科技前沿、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型人才,而且需要具备多维知识结构、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和新型生产工具的应用型人才。

(2) 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生产工具的科技属性强弱是辨别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显著标志。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新材料技术等融合应用,孕育出一大批更智能、更高效、更低碳、更安全新型生产工具,为形成新质生产力提供了物质条件。特别是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非实体形态生产工具的广泛应用,极大地丰富了生产工具的表现形态,推动生产力跃上新台阶。

(3) 更广范围的劳动对象是新质生产力的物质基础。劳动对象是生产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得益于科技创新的广度延伸、深度拓展、精度提高和速度加快,劳动对象的种类和形态大大拓展。一方面,人类从自然界获取物质和能量的手段更加先进;另一方面,人类通过劳动不断创造新的物质资料,并转化为劳动对象。例如,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成为重要劳动对象,既直接创造社会价值,又通过与其他生产要素的融合进一步放大价值创造效应。

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科学技术、管理等要素,都是生产力形成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只有生产力诸要素实现高效协同,才能迸发出更强大的生产力。在一系列新技术驱动下,新质生产力引领带动生产主体、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生产方式变革调整,推动劳动力、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要素便捷化流动、网络化共享、系统化整合、协作化开发和高效化利用,大幅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二) 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

与传统生产力形成鲜明对比,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①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特征和发展重点[EB/OL]. (2024-03-01). <https://www.12371.cn/2024/03/01/ARTI1709247847747483.shtml>.

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

(1) 以创新为第一动力,形成高科技的生产力。科技创新深刻重塑生产力基本要素,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推动生产力向更高级、更先进的质态演进。

(2) 以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主要载体,形成高效能的生产力。产业是生产力变革的具体表现形式,主导产业和支柱产业持续迭代升级是生产力跃迁的重要支撑。作为引领产业升级和未来发展的新支柱、新赛道,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效能更高,具有创新活跃、技术密集、价值高端、前景广阔等特点,为新质生产力发展壮大提供了巨大的空间。

(3) 以新供给与新需求高水平动态平衡为落脚点,形成高质量的生产力。供需有效匹配是社会大生产良性循环的重要标志。社会供给能力和需求实现程度受生产力发展状况制约,只有依托高水平的生产力才能实现高水平的供需动态平衡。

二、数字经济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

数字经济是经济发展中创新最活跃、增长速度最快、影响最广泛的领域,对增强发展新动能、提升发展韧性、畅通发展循环具有重要作用,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①

从劳动者角度来看,提升数字素养和技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保障,同时也是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因素。生产力的变革要求劳动者必须具有相应的数字素养和技能,如熟练操作智能设备、处理复杂数据、解决技术应用问题等,以便高效地参与到数字经济的生产活动中。对于劳动者来说,增强数字素养与技能能够使他们更好地掌握新技术、新工具,提升工作能力与效率,进而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的科技创新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

从劳动工具角度来看,关键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是构筑新质生产力的内生动力。5G 正全面构建我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基础设施,目前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 5G 网络,实现全国地级市和县城城区全覆盖。同时,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迅速,产业规模持续扩大,融合应用不断提速,总体处于全球第一梯队。此外,脑机接口作为生命科学和信息技术深度交叉融合的前沿新兴技术,是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打造竞争新优势的未来产业领域。中国在脑机接口领域已成为全球重要竞争者,尤其在非侵入式技术和医疗应用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从劳动对象角度来看,我国数据要素价值持续释放,提供了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一方面,我国数据要素市场的加速建设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丰富的要素供给,它通过打破数据流动障碍、优化配置结构,使数据高效流向关键领域,促进经济全面改善。通过制度设计,增加数据供给、挖掘需求场景、提升供需匹配效率,供给新质生产力更多优质数据。另一方面,我国“数据要素×行动计划”为新质生产力拓展了丰富的应用场景。2023 年底,国家数据局等 17 部门联合发布《“数据要素×”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 年)》,在 12 个行业就如何发挥数据乘数效应进行详细部署,为制造业、农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等诸多行业夯实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物质基础。

^①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2024 年)[R/OL]. (2024-08-27). <http://www.caict.ac.cn/kxyj/qwfb/bps/202408/P020240830315324580655.pdf>.

从产业创新角度来看,我国数字经济产业创新发展,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新质生产力是伴随技术革命性突破引致的产业跃迁升级形成的生产力新质态,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未来产业孕育兴起壮大的过程。数字经济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的新经济形态,通过数字创新赋能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和新业态发展,加快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发展。

数字产业化作为数字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数字技术、产品、服务、基础设施和解决方案,为新兴产业的崛起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对新兴产业的培育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关键的支撑作用。一方面,电子信息制造产业升级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电子信息制造作为现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技术革新、产品创新以及产业升级对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起到关键推动作用。随着电子信息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我国的电子信息企业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推动技术创新、优化生产流程等方式,不断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市场地位,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时,电子信息产品创新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广阔的应用场景,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消费电子产品的普及,以及工业控制、医疗电子、汽车电子等领域对电子信息产品的需求增长,都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的创新发展有力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作为数字产业化的关键领域,其创新成果深度融入生产环节,成为塑造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力量。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先进制造技术与新材料技术的深度融合,以工业互联网平台、智能制造体系中运用的计算机辅助设计(CAD)、制造执行系统(MES)等工业软件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与工具持续迭代升级并广泛应用,催生出众多智能、高效、低碳且安全的新型生产工具,革新生产模式,拓展生产边界,极大地解放了劳动者。同时,它们丰富了生产工具形态,促使生产制造流程向智能化演进,制造范式从规模生产向规模定制转变,全方位推动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夯实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根基。

我国产业数字化的深入推进,持续扩大新质生产力新空间。产业转型升级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动力之一,产业数字化扩展了传统生产力的效率边界,是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转型的主要表现。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渗透,使传统产业的生产技术、工艺、流程、方式发生变革,让企业的资源配置、组织管理和市场运营等发生质的转变,为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更多的价值实现场景。同时,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不断向纵深推进,激活了新质生产力新的需求空间。数字技术提升供需对接效率,实现了潜在服务人群广泛的覆盖,网约车、远程办公、在线教育、数字文化、智慧旅游等新兴服务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共享经济、平台经济、直播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有力地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此外,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日益激发新业态与新模式的活力,推动云看展、云健身、VR虚拟旅游以及数字人等新兴消费模式不断涌现,数字消费新空间持续拓展,充分显示了新质生产力作为创新载体的强大力量。

三、数字经济与新质生产力的融合发展路径

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有助于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

优化路径。^①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主要是指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农业、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本质是应用新一代数字科技,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的过程,既是数字技术不断向实体经济的研发、生产、销售、流通环节渗透融合,创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重塑产业组织形态与制造流程,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以及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的过程,也是数字技术受特定需求场景拉动,不断迭代演进甚至萌生出适应性技术和相应产业部门的过程。^②

新质生产力是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而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正是实现这一提升的关键路径。首先,数实融合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利用数字技术精确分析市场需求和生产状况,帮助企业迅速调整生产计划,最大化资源利用效率。其次,数实融合推动了技术创新与应用,为企业提供了先进的研发工具和方法,加速了新产品和新服务的开发,进一步增强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最后,数实融合加速了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通过引入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先进技术,传统制造业、服务业等产业实现了智能化、自动化改造,不仅显著提升了整体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还促进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先进生产力形态。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平台,推动了新技术的研发、应用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数实融合通过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打破了传统行业之间的物理壁垒和信息壁垒,使不同行业之间的知识、技术和资源得以自由交流与共享。这种共享为跨界融合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基础和技术储备,进而推动了科技创新的发展。数字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能够处理和分析海量数据,挖掘出不同行业之间的内在联系和潜在价值,为科技创新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推动更多的前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同时,数实融合还极大地激发了企业的创新潜能,促使企业纷纷加大研发投入,积极探索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模式,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

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构建数字生态系统内供需共生的演化机制,其本质是通过数实融合技术体系驱动供给侧创新与需求侧升级,形成具有自优化特征的高质量生产力范式。数实融合给生产流程、供应链管理及市场策略带来了系统性变革,在此基础上实现了更高水平的供需有效匹配。数字经济时代,消费者的需求变得多元化、个性化,这种变化促使企业从“以产品为中心”转向“以用户为中心”,通过数据分析、用户画像等手段精准获取并分析消费者的偏好、行为模式及潜在需求,进而指导生产,实现“需求决定生产”的定制化模式。借助先进数字技术,企业还能够实时追踪市场动态,快速响应消费者需求的变化,确保市场供需两端的高效对接。此外,数实融合还促进了供应链管理的数字化、智能化,通过区块链、物联网等技术提高供应链的透明度和可追溯性,确保产品从原材料采购到最终交付给消费者的每一个环节都符合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了供需匹配的效率和精准度。

^① 刘惠惠,高嘉遥.数实融合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多元优势、动能解析与布局完善[EB/OL].(2024-11-07).<https://link.cnki.net/urlid/13.1356.F.20241106.1728.002>.

^② 数实融合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EB/OL].(2023-11-09)[2024-11-09].<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231109/007bb55c193b448fb8514dc4d45a81fa/c.html>.

第六节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数字经济

作为一种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主要依赖数据、网络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通过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来重塑经济结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作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理论工具,为理解数字经济中资本积累、劳动关系变化提供了重要的视角。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中的劳动价值来源及资本积累本质,这些理论为研究和理解数字经济中的新型劳动形式与平台资本垄断提供了理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数字经济的关联

(一)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与数字经济生产力的新构成

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提出,生产力由劳动者、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三部分组成,是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历史变革的物质基础。具体来说,劳动者作为生产力的主体,借助生产工具作用于劳动对象以创造价值。生产力的发展,尤其是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同时也推动了社会经济形态的更替。

在传统工业经济中,生产力的构成集中于物质生产领域,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模式和机器设备的不断升级构成了生产力的核心。工业革命带来的蒸汽机、电气化等技术变革,使生产力水平实现了飞跃。然而,这种劳动形态的进步也伴随着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控制的加强,资本通过不断提高生产效率和剥削劳动者剩余价值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后,生产力的构成逐渐从物质转向数据、信息和算法等新兴领域,生产力的形态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这一转变不仅改变了生产工具和劳动过程,还促使资本控制的方式发生演变。与工业革命时期的生产力提升相比,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力提升不仅依赖于劳动者的技术技能,还依赖于数据分析、算法优化和智能化设备的使用。

在数字经济中,数据成为生产力的核心要素之一,并逐渐取代传统的生产资料地位。与传统的自然资源不同,数据来源于日常的社会活动,包括用户在网络平台上的点击、搜索、购买等行为,这些数据经过加工、分析和整理后,成为企业的资产和新型资本。例如,社交媒体平台通过对用户行为数据的收集和分析,实现了商业价值的提升,用户的数据不仅用于平台的运营,还被转化为广告商的目标信息,从而提升广告投放的精准性和效益。数据的核心要素地位使得其逐渐成为生产力的重要部分,平台公司通过数据的积累和分析在资本市场上占据了主导地位。根据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数据可以被视作一种新的“生产资料”,它与传统的机器、工具等不同,但本质上依然属于资本控制。

同时,算法和人工智能成为推动生产力提升的关键力量。算法不仅可以对数据进行高效处理,还可以应用于物流、金融、市场分析等多个领域,提高生产效率。例如,电子商务平台利用算法进行商品推荐、客户分析和广告投放,通过实时分析用户需求并预测消费行为,能够提升市场的准确性和响应速度;物流公司使用算法优化运输路线和仓储布局,不仅降低了成本,还提升了物流配送效率。马克思生产力理论指出,技术进步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根本动力之一。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技术的进步往往伴随着劳动者的异化。数字经济

中,劳动者特别是平台经济中的“零工”劳动者受到了算法的直接控制,他们的工作内容、劳动时间和收入水平通常由算法设定,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受到极大的限制。平台企业利用算法实时监控和管理劳动者,剥夺了劳动者对自身劳动的控制权,同时将他们的劳动商品化为符合资本积累需求的标准化产品。

从马克思主义视角来看,算法不仅仅是提高生产力的工具,更是资本加强对劳动者控制的手段。在生产效率提高的背后,资本对劳动者的控制更加隐蔽而有效,劳动者逐渐丧失对自身劳动过程的自主权。在资本的驱动下,算法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加强了资本对劳动过程的支配,劳动者的工作成为算法设定的机械性重复劳动。这一现象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者异化的分析。

(二) 劳动价值论与剩余价值理论在数字经济中的延伸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依然适用,但劳动形式则发生了重要变化。

劳动价值论的核心在于认为商品的价值来源于人类劳动,即一切有价值的物品都是通过劳动创造的。然而,在数字经济中,劳动形式从传统的物质劳动逐渐向数据生成过渡。例如,社交平台上用户的每次点击、搜索和发布行为都会生成数据,这种劳动并非传统的体力或技能劳动,而是一种新型的“数据劳动”,这种劳动生成的数据被平台转化为经济价值,推动了商业利润的产生。

在这种背景下,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字经济中表现为数据劳动和信息生产的形式。算法设计师和数据分析师的工作也成为劳动价值的体现,他们的劳动直接影响到数据的处理、算法的优化和平台的运营效率。在传统经济中,劳动者通过生产活动创造商品的价值,而在数字经济中,劳动者的创造性劳动更多地体现在算法的设计、数据模型的优化和用户界面体验的改进等方面。

劳动价值论在数字经济中的延伸还表现在创意劳动和知识劳动的异化中。数字平台上的内容创作者如博主、视频创作者、独立音乐人等,他们的创作活动不仅在平台上吸引了流量,还给平台带来了广告收入。虽然这些创作者通过劳动产生了内容,但内容的经济价值却大部分都归属于平台企业。平台企业通过提供广告分成等形式,让创作者获得一定的收入,但与平台实际的商业收益相比,这些创作者的劳动收入相对微薄。资本家在这里通过平台控制内容发布和广告分成的机制,将内容创作者的劳动价值部分转化为平台的资本积累,而创作者往往并未得到其劳动的全部成果。

在数字经济中,剩余价值的生产方式和分配机制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资本通过控制生产资料和劳动过程,从劳动中提取剩余价值。这一理论在数字经济中依然适用,但具体方式有所不同。在数字经济中,平台通过对用户数据和算法的垄断性控制,实现了剩余价值的积累。例如,社交媒体平台利用用户行为数据进行精准广告投放,使广告效果显著提升。平台通过广告商收取费用,而用户作为数据的提供者,却并未从中获得任何经济回报。广告的点击和展示量直接关系到平台的收入,但用户的数据和行为作为创造价值的核心来源,却往往没有得到相应的经济补偿。这种分配模式显示出数字经济中的资本垄断特性,即通过数据控制实现对劳动成果的权利占有,劳动者和用户实际上并未全部享受到自身劳动所带来的价值增值,绝大部分剩余价值被平台所剥夺和占有。

这种新的剩余价值生产和分配模式还表现在劳动者(用户)与平台的关系上。在传统的劳动关系中,工人通过劳动合同受雇于企业,而在数字经济中,劳动者的角色更加多元化。例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零工”劳动者与平台的关系并非传统的雇佣关系,而是“合作”或“服务”关系。平台将这些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标准化、数据化,通过平台系统进行任务分配和绩效管理,劳动者的收入和任务量直接受平台控制。平台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规避了传统的雇佣责任,还从劳动者的剩余劳动中提取了剩余价值,而劳动者作为服务的提供者,往往无法获得长期的经济或社会福利保障。这种新型剩余价值榨取机制在数字经济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

此外,平台还能够通过算法和数据对劳动过程进行全程监控与优化,使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时间安排、收入水平完全依赖平台规则。平台通过设定激励机制和评分系统,引导劳动者在最有利于平台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工作,而劳动者在这种管理模式中被数据化为可以量化和衡量的生产要素。这种方式不仅加深了劳动者的异化,还使劳动关系更加不平等。资本在数据垄断的支配下,通过算法实现了对劳动者劳动过程的无缝管理,剩余价值的分配进一步向平台资本倾斜。

(三) 数字经济生产力的发展对社会关系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会引起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变革,推动社会关系的变化。在传统工业社会,生产力的提升带动了资本积累,进而塑造了工厂主与工人之间的对立关系。然而,在数字经济中,生产力的提升并未带来相应的经济结构改善,而是进一步拉大了资本和劳动的差距。

在数字经济的零工模式下,劳动者的雇佣关系被高度灵活化,他们不再以长期雇佣形式服务于单一企业,而是以合同工或个体户的身份进行分散、临时的劳动。平台企业提供了就业机会,但同时也规避了对劳动者的雇佣责任。这种灵活的劳动模式虽然使劳动者的工作时间更为自主,但也让他们在社会保障、职业稳定性等方面陷入弱势地位。这种劳动关系的非稳定性,使劳动者对资本的依赖性更强。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生产力的高扩展性加剧了资本的集中趋势,科技巨头通过对数据和算法的掌控,占据了绝大部分市场份额。这种集中的生产力结构使资本在数字经济中形成了垄断,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不平等现象。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资本积累理论,资本的集中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不平等的加剧,这一现象在数字经济时代可能更加突出。

智能化和技术进步是数字经济提升生产力的关键因素,但也带来了就业问题和收入不平等的加剧。马克思主义认为,技术进步虽然提升了生产效率,但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也往往导致大量工人失业。在数字经济中,自动化生产流程和智能算法逐渐取代传统工作岗位,可能造成结构性失业。例如,自动驾驶技术使得交通运输行业的传统司机岗位受到冲击,数字人和智能客服可能逐渐取代人工客服的工作岗位。智能化带来的就业问题使得劳动力市场更加不稳定,劳动者的收入和社会保障也受到更多影响。资本通过智能化技术获得了更高的生产效率和利润,而劳动者在技术进步的冲击下更容易失业。这种就业矛盾显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对立,资本不断寻求更高的生产效率,而劳动者则因失去工作机会而被边缘化,可能进一步加大贫富差距。

二、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关系重构

（一）马克思生产关系理论与数字经济中的新变化

在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生产关系是指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关系。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关系是构成社会经济结构的核心组成部分,直接影响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利益分配以及社会结构的形成。生产关系不仅是经济运行的基础,还对社会整体的运行方式有决定性作用。生产关系的核心是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传统生产关系中,生产资料由少数人拥有,大多数劳动者不直接拥有生产资料,因此只能通过出卖劳动力来获取生活必需的收入。这一关系决定了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处于依附地位,他们创造的劳动价值最终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控制,而劳动者自身只能获得维持生存的部分。

此外,马克思理论还指出,生产关系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断调整。当生产力水平提升到一定程度,传统的生产关系将无法适应新的生产需求,新的生产关系将逐渐形成,以更好地适应新的生产力结构。因此,生产关系并不是一种恒定的社会结构,而是不断演化以适应社会发展和技术发展的体系。

随着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生产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传统的雇佣关系逐渐被新的平台化和灵活劳动关系所替代。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劳动关系形式的转变上,也在生产过程的控制方式上表现出显著差异。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在数字经济中的广泛应用,使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关系发生显著的变化,进一步重塑了生产关系的结构。

一方面,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关系正在从传统的雇佣制逐渐向平台经济、零工经济模式转变。传统雇佣关系下,劳动者通过劳动合同获得报酬及基本的社会保障,生产资料和管理由雇主掌控。而在数字经济时代,平台企业逐渐通过数据和算法重新定义劳动关系,将劳动者视为“独立合同工”或“服务提供者”,而非传统意义上的员工。例如,网约车司机、外卖配送员等劳动者与平台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劳动合同关系,而是以任务合作的形式为平台提供服务。

另一方面,数字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和数据实现劳动过程的商品化管理创新。传统劳动管理依赖人工监督,而数字平台将劳动过程数据化,实时记录行为轨迹、任务节点等信息,这种数据化操作本质上是劳动转化为可量化的商品要素,并为劳动商品建立“价值标签”。例如,外卖平台以“响应时间”“送达准时率”作为商品化考核指标,网约车平台则依据“用户评价”“服务时长”构建商品化分级体系。平台借助数据化管理,将工作内容拆解为独立可交易的任务单元,通过商品化逻辑量化评估劳动者绩效,实现对劳动价值的精准定价。在此过程中,劳动者的工作状态完全服从于平台对“商品价值最大化”的算法规则,劳动过程最终被转化为数据驱动的商品执行体系。

这种新型的劳动商品化模式,使得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被平台企业转化为数据驱动的生产资源和资本积累手段;劳动者的工作不再由个人的劳动内容决定,而是依赖于平台的规则和算法分配,劳动者逐渐失去对自身劳动的控制权,劳动过程和成果被平台算法所掌控。这一现象已超越劳动关系的形式调整,从本质上反映了数字经济中生产关系的深层变革。

具体来看,数字经济中生产关系的结构性调整,集中体现为劳动力与资本的关系重构、数据作为核心生产资料的支配性作用等本质层面的变革。

在工业经济中,劳动者与资本之间存在稳定的雇佣关系,劳动者依赖资本提供的生产资料,通过劳动获取报酬,获得一定的社会保障。然而,平台经济的兴起引发了生产关系的本质性变化:平台企业通过去雇佣化与外包化策略,实质上剥离了传统雇佣关系中资本对劳动的保障责任,劳动者不再通过劳动合同获得稳定社会保障,其收入与工作状态高度依赖平台任务安排;而平台企业则以“合作伙伴”等形式规避工伤保险、薪资保障等义务。这种变化打破了工业经济中“资本保障劳动”的基本逻辑,使劳动者从“受雇主体”转变为承担经济风险的独立个体,资本则通过数据控制与算法分配强化了对劳动过程的支配权,形成“资本控制强化而责任弱化”的生产关系本质重构。

此外,平台企业通过大数据和算法分析,使得平台企业对生产过程和用户行为的控制更加隐蔽而精确,使其在生产关系中的主导地位更加巩固。

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资料,成为控制劳动过程和生产关系的关键手段。数据在生产关系中的新角色使得平台企业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和精度管理劳动者,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和效率在数据驱动下变得透明化和标准化。平台企业通过收集和分析用户与劳动者的数据,对劳动过程中的各个细节进行实时监控和评分反馈,使得劳动者的绩效直接依赖平台的数据管理系统。劳动者在这种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变得更加被动。数据使得劳动过程不再是劳动者自主完成的过程,而是在平台规则和数据系统的控制下进行的标准化生产活动。

在这种数据驱动的生产关系中,用户也逐渐被平台转化为一种“生产要素”。例如,电商平台上的用户不仅是商品和服务的消费者,还是数据的生产者,用户在平台上的每一次点击、浏览、消费和互动行为都会生成数据,这些数据被平台收集和分析,成为推动平台价值增长的宝贵资源。用户在生产关系中的角色从传统的消费者逐渐转变为数据生产的参与者。这种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用户无形中成为平台利润的贡献者,平台企业通过对用户数据的控制实现了生产资料的无形积累,生产关系从传统的服务关系逐步转向数据依赖型的生产关系。

(二) 生产关系变化的原因与背后逻辑

数字经济中生产关系的变化主要由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所驱动。算法和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使平台企业能够对劳动过程和用户行为进行全面控制,从而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关系模式。

数字经济中的技术进步,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新的生产关系提供了技术基础。平台企业通过数据积累和算法优化,能够实现对劳动者和用户行为的管理。例如,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技术能够精准分析用户偏好,并进行行为预测,为平台提供个性化的推荐服务。这些技术手段不仅提高了平台的生产效率,还使得劳动过程的管理更加精准和高效。

技术进步在提升生产力的同时,也强化了对劳动的控制,使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平台企业依赖数据反馈和算法评分,劳动者的工作内容和行为受控于数据管理系统。这种技术进步使劳动过程变得透明和可控,平台企业在不承担传统雇佣责任的前提下,仍然能够实现对劳动者和用户的控制,形成了一种隐性但高效的控制机制。这种新型生产关

系的出现使得劳动者逐渐丧失对自身劳动的控制权,生产过程的自主性被数据和算法逐渐取代。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生产关系会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调整和变革。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变化正是生产力提升的直接结果。数据和算法逐渐成为新的生产力要素,使得生产关系发生相应的转变。平台企业通过对数据的积累和利用实现了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逐渐适应了数据驱动的生产力结构。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中的生产关系变化反映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大数据和 AI 算法的技术进步推动了新的生产方式,平台企业通过算法和数据控制实现了对劳动过程的管理。数据驱动的生产力结构不仅改变了生产过程,还形成了新型生产关系,使得平台企业能够在不直接雇用劳动者的情况下,通过数据控制对劳动过程进行全程掌控。这一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和用户的劳动价值逐渐被平台企业所吸收,形成了新的资本积累模式。

三、数字经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

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数字经济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为生产关系的重构提供了新的方向。数字经济的发展正在推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深刻变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框架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践和发展提供了新的贡献。

(一) 数字经济对社会公平的启示

数字经济的发展在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社会公平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资本积累的过程伴随着资源的高度集中和财富的不平等,而数字经济下这一趋势可能进一步加深。数据和算法逐渐成为核心生产资料,少数平台企业通过数据垄断和算法控制市场中占据主导地位,资本的集中现象越发显著。

数字经济中的平台垄断形态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分析提供了新的视角。数据和平台的垄断不仅提升了资本的控制力,还使劳动者的价值贡献逐渐被数据化,并被平台企业占有,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变得更加隐蔽。

数字经济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另一贡献在于劳动关系的重新界定。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劳动者通过出卖劳动力获得报酬。然而在数字经济中,数据劳动和平台劳动的形式增加,劳动价值的实现方式逐渐异化。新的劳动价值实现方式揭示了数字经济中剩余价值的剥夺模式,即通过数据劳动和用户行为将价值集中于平台,资本对劳动的剥削在数字经济中进一步隐形化、深层化。

数字经济的发展还提出了新的社会公平议题,如数据共享和资源开放。马克思主义理论主张实现资源的社会化以推动社会公平,而数据和信息资源具有可共享、易传播的特性,为资源开放和共享提供了技术上的可能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如何推动数据共享和资源开放,以削弱数据和算法垄断带来的社会不平等,将成为数字经济下实现社会公平的新方向。

（二）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数字经济的挑战与机遇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生产关系的调整。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推动了生产力的高度提升,但也暴露出一系列社会转型的挑战。

在数字经济中,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现象日益复杂化,平台企业通过数据垄断和算法控制形成了新的生产资料集中趋势。这种新的资本控制模式不仅强化了资本的垄断地位,也加剧了劳动者在新型经济体系中的边缘化。

在数字经济的新型资本积累模式下,资本对数据资源和劳动价值的占有进一步深化,劳动者和用户的劳动成果被平台通过数据形式进行再分配,劳动异化现象越发隐蔽。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逐渐丧失对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控制,这种劳动异化在数字经济中表现得更加深刻,即平台通过算法控制劳动者的工作内容、时间和评价,劳动者的自主性被严重削弱,劳动成果逐渐被数据化,因而成为平台积累资本的一部分。

同时,数字经济也为社会公平和生产关系重构提供了新的机遇。数据资源的共享潜力为实现资源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属性提供了可能性。由于数据的非物质性和可复制性使其具备共享的条件,因此数据资源的开放和去中心化管理将有利于削弱少数资本的垄断。例如,区块链等去中心化技术通过透明的智能合约和数据分布式管理,推动数据资源在社会中的公平分配,减少了平台企业对数据的垄断控制。这种模式非常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源共享和生产资料社会化的理论,将为未来社会的公平发展提供重要的技术基础和支持。

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数字经济有望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支持下实现更加公平和共享的社会结构。数据资源的开放、区块链去中心化管理等方式可以推动资源的公平分配,实现资源共享的社会目标。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不仅为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新的路径,也为社会公平和生产关系的重构提供了契机。

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应当围绕资源共享、数据公开和生产关系重构去展开,为未来社会提供新的发展思路和结构性支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社会公平议题、劳动价值异化现象和数据资源共享的理论支持,为未来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理论依据。数字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数据资源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公共属性,将会极大地缓解数据垄断和资源不平等带来的社会问题,推动一个更加公平、开放的新型社会结构的形成。

四、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数字经济发展方向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的延伸,为未来数字经济开放共享的发展路径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也为探索新型社会经济结构提供了方向指引。

（一）数字生产力的社会化趋势

未来数字经济社会,生产力的社会化表现将尤为显著。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随着生产力发展,社会化的生产形式逐渐取代个人化和分散的生产模式。在工业经济中,生产力的社会化体现在规模化生产和资本集中的生产方式中,企业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建立智能

化流水线和集约化生产来提高效率。在数字经济中,生产力的社会化通过平台经济、数据共享和跨界协作实现,以提升资源配置的效率。

平台企业通过数据积累、技术创新和用户资源的整合,建立了一个连接各类生产要素的网络,使原本分散的资源通过协作整合,为经济生产活动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例如,共享经济中的平台企业通过整合闲置资源,将车辆、住房等资源的使用率最大化。这种模式下,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显著提高,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社会化,符合马克思提出的生产力社会化趋势。

此外,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流动和信息共享,加快了生产要素的连接,使得劳动者、企业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平台企业的用户既是服务的消费者,也是数据和信息的贡献者,通过提供数据、分享体验等方式参与到生产过程中。这种双重身份反映了数字经济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社会化特征。原本在传统生产关系中较为对立的资本与劳动关系在平台经济中趋向合作和共生,生产过程中的协作性得到提升。

(二) 数字经济的未来方向: 开放与共享的发展路径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看,数字经济的发展为生产关系重构和社会资源共享提供了新的路径。数据和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的普及不仅推动了生产效率的提升,还为资源共享和开放化发展提供了可能。

(1) 数字技术和数据资源的普及应用给资源共享与数据开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与传统生产资料不同,数据、算法和信息资源具有非物质性特征,能够被无限复制、传输、应用,这为公共资源共享提供了潜在的技术支持。

例如,开源软件、知识共享平台和开放数据的全面推广,使得技术资源和数据资源能够被全社会广泛使用。开源平台提供了基础代码和算法资源,鼓励开发者在现有成果基础上进一步创新。这种模式打破了传统生产资料的专有性,使得知识和技术成为一种共享资源。数字化资源的开放有助于突破“信息孤岛”现象,减少数据垄断带来的效率损失,不断推动数据应用的创新发展。

(2) 数据资源的广泛开放能够有效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率,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和信息。数据的开放共享意味着更多人能够参与到数据的分析和应用中,从而推动数据创新的多样化。例如,政府和公共部门的开放数据计划,通过向社会公开公共数据资源,支持社会组织 and 企业的创新。这种数据开放能够降低社会创新成本,提升社会整体的数字生产力。

尽管数据资源共享具有极大的价值潜力,但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仍需克服数据垄断、技术标准等诸多障碍。当前数据资源和数字技术高度集中在少数企业手中,缺乏公开和透明性,导致社会创新和生产力发展受限。平台企业的数据垄断不仅阻碍了数据的创新应用,也加剧了数据市场的不平等。因此,推动数据共享需要制定更加开放的政策,满足数据资源服务于社会创新和生产力发展的需求。

(3) 数字资源的共享经济模式为资源的有效利用提供了新的路径。共享经济模式中,平台企业通过整合社会上的闲置资源,实现了资源的共享利用,推动了生产力的社会化发展。例如,住房、交通出行等领域的共享平台通过集成社会上闲置的住房和车辆,实现了资源的高效配置。这种共享经济模式为社会生产力的提升提供了可能。

平台经济和共享经济模式的推广使得劳动者能够更加灵活地参与经济活动,不再局限于单一的工作模式。然而,这种模式给劳动者的经济保障也带来了挑战。由于劳动者在平台经济中的“合作伙伴”身份,收入稳定和社会保障等问题并未得到有效的解决。平台企业对资源的控制使得劳动者在这一生产关系中承担了更大的经济风险。因此,未来要进一步完善共享经济模式,需要在灵活用工和劳动者保障之间取得平衡,通过法律制度保障、数字治理强化、平台算法透明等具体措施,使生产力的发展成果能够惠及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推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构建更加公平的新型数字经济生产关系。

思考题

1. 4G 开启了以智能手机和 App 为主要产业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那么 5G 开启的万物互联时代,将会引领什么主导产业呢?
2. 数字经济专业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新专业,请结合对数字经济定义和内涵的理解,谈一谈数字经济专业课程会涉及哪些相关的专业内容。
3. 数字经济是虚拟经济吗? 二者的区别是什么?
4. 举例说明数字经济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作用。
5. 结合真实问题思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下的数字经济挑战与机遇。
6. 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谈一谈对数字经济发展方向的判断和看法。
7. 对我国 ICT(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上市公司进行网络调研,了解我国的 ICT 产业发展现状。
8. 根据数字经济体系框架,总结和整理数字经济包括哪几部分主要内容。
9. 通过对某平台企业运营状况的调研,分析我国平台经济发展现状的利弊及趋势。

扩展阅读 1-1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即测即练

